

以物鉴史

我们胜利了！

——历史时刻的文物见证

1945年8月21日，湖南芷江机场迎来一架特殊的日机。机上搭载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，他们此行是与中国方面就投降事宜进行初步洽谈。这一场景在场的中外记者用镜头记录下来，成为中国战区受降程序启动的标志性影像。在随后的交涉中，双方就受降的具体安排达成共识，为后续的正式受降奠定基础。

9月2日，东京湾的美国军舰“密苏里”号上举行了具有国际意义的投降签字仪式。美、英、中、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与日本代表在投降文件上签字，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律层面的正式终结。这份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投降文件，以文字形式固化了日本接受战败结果的国际共识。仪式现场，同盟国代表与日本代表的神情举止通过影像资料留存下来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见证。

一个星期后的9月9日，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。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投降。现场的布置、双方人员的站位以及签字的过程，都被详细记录下来。这一仪式的举行，标志着日本在华军事力量正式向中国政府投降，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标志。

领土的回归更是令人激动。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，台北市公会堂（今中山堂）举行了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。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身着军装，神情庄重地坐在受降席上宣布：自即日起，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，所有一切土地、人民、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。这一宣告意味着，自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被日本占据的台湾地区，历经半个世纪

黄黎

的分离，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宣告完毕，陈仪拿起毛笔在文件上郑重签字。那支毛笔笔杆挺直，饱蘸墨汁，每一笔落下都沉稳有力，凝聚着台湾民众半个世纪的期盼与民族的尊严。典礼结束后，台湾各地民众以多种方式庆祝这一时刻，街头巷尾出现的“庆祝台湾光复”标语，以及人们脸上流露的神情，都反映出台湾民众对回归祖国的认同。这一事件作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被载入史册，成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历史依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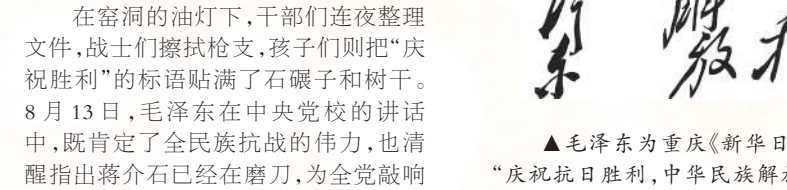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，中国各地呈现多样的庆祝场景。

延安宝塔山下，火把如游龙般蜿蜒，延河两岸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在延安总部绘制的《中国抗战敌后战场形势



▲1945年10月25日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。

要图》上，那些标注着敌后根据地的区域，此刻成为群众欢庆胜利的海洋。在窑洞的油灯下，干部们连夜整理文件，战士们擦拭枪支，孩子们则把“庆祝胜利”的标语贴满了石碾子和树干。8月13日，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，既肯定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力，也清醒指出蒋介石已经在磨刀，为全党敲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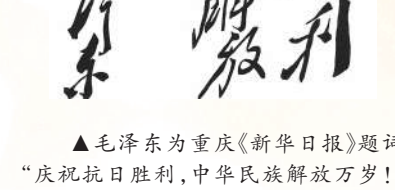


警钟。延安，这座见证了艰苦卓绝斗争的小城，在抗战胜利时刻所展现出的，不仅是狂欢，更是一种历经磨难后的从容与坚定。

重庆、上海、昆明等城市的民众自发走上街头，以燃放爆竹、悬挂国旗等方式表达喜悦之情，这些场景被《中华图画杂志》的《日本投降专号》收录。

从国际层面的联合反击到国内各界的持续抵抗，从领土主权的恢复到社会民心的凝聚，共同构成了“我们胜利了”

▲毛泽东为重庆《新华日报》题词“庆祝抗日胜利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



的完整内涵。当我们回望这些历史见证，看到的不仅是战争的结束，更是一个民族在历经磨难后所展现出的坚韧与团结，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的历史必然。这些留存下来的文物与历史照片，时刻提醒我们铭记胜利的来之不易，更启示着维护和平的重要意义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国家博物馆）



以上图片均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



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特藏中收藏着一张1945年8月11日《大众日报》号外（见上图），见证了日本投降和抗战胜利这一重要历史性时刻。

这张号外整版红色印刷，以极其醒目的特大字号印着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”主标题，在当时众多宣告抗战胜利消息的号外中显得独特和醒目。

《大众日报》最初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，1939年1月1日创刊于山东沂水，发刊词明确提出该报的使命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大众服务，“尽量登载各方面有益于抗战的言论”。除了在边区发行外，

一张“号外”记录胜利喜讯

吴密

《大众日报》还在敌占区散发张贴，在抗战中成长和壮大。

1945年8月初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，位于莒南县彭家仕沟村的大众日报台异常繁忙，工作人员昼夜值守，不断收到胜利的消息：8月9日上午，收到苏联已于昨夜对日宣战的消息；9日夜，收到毛主席发表的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》声明；10日晚，忽然收到新华社延安连发三遍的急电——据合众社接获日本东京广播，日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。对于日本投降这一重磅消息，大众日报广播室编辑科谭克开始还不敢相信，当即去电询问，新华社顷刻复电“消息真实”。喜讯传出，全社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。子夜时分，电台又收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接收日伪投降的《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》。11日的《大众日报》刚刚印完，下一期按例要到13日才能出版。这么重大的新闻一刻也不能等，为了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根据地军民，社长陈沂当即决定增出号外。《大众日报》各部门工作人员

放弃休息，工人连夜赶排，刻字工人张伟东用木板刻制了拳头大小的行书“号外”和其他大字标题。早晨5点半，报纸全部排完并打出大样，陈沂阅后签字赶印。

日本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之后，全国出现了号外满天飞的盛况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在10日晚上的10点就出版了《接受波茨坦宣言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》号外，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也在10日深夜出版了有关日本投降的号外。《大众日报》红色号外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一份整版红色印刷抗战胜利消息的号外，也是目前所见红色号外中出版时间最早、版面最大、字体最大的号外。

号外计划印两万份，工人们全力以赴地突击排印，报纸发行员则守候在机器旁，印好的报纸带着油墨的芳香，很快就分送到根据地军民手中，或张贴在大街上。可以说，这张号外是一份从内容到形式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的红色文物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图书馆）

《胜利之夜》：一幅画中的抗战记忆

刘新吾

在重庆建川博物馆展厅内，一幅尺幅不大的画作静静挂于墙上（见右图）。闪闪暖灯下，父亲背对观众，高举幼子；母亲注视婴儿，笑容温婉；一只花猫蜷伏于地，似在倾听人间欢腾。画幅左侧一行小字——“日本投降后三日，子恺书赠”。这便是国家一级文物——丰子恺的《胜利之夜》。

乍看寻常，画作却如一个窗口，照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。

1945年8月10日，重庆酷暑难耐，一栋青砖灰瓦的平房内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潘永元颤抖着扭开送音开关：“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重大新闻……日本无条件投降！”这则消息如闪电划破漫漫长夜，响彻云霄，山城瞬间沸腾。

史料记载，那夜的重庆宛如熔炉：民众如潮水般涌上街头，素不相识者握手拥抱，吼声、歌声、锣鼓声交织；餐馆里禁酒令形同虚设，猜拳声彻夜不绝，商店高挂“庆祝胜利，八五折廉价”的布招……狂欢的声浪中，丰子恺位于沙坪坝的陋室灯火通明。平日谦和的友人破门讨酒，他翻出珍藏佳酿，众人喧闹至深夜两点。待客人离去时，已是夜深人静。丰子恺辗转难眠，思绪如潮。

女儿丰一吟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他想起了被毁的缘缘堂……想起了惨败的日本的命运，想起了奇迹般地胜利了的中国的前

途……”这位以“缘缘堂”为精神家园的画家，以笔为枪，创作《漫画日本侵华史》控诉暴行，始终怀抱“人间情味”的哲学。

三日后，丰子恺挥毫泼墨，将心潮凝于《胜利之夜》。画中无宏大场景，仅一家四口与一猫，却暗藏深意：父亲举子，喻民族新生；母亲含笑，示坚韧守望；幼子伸手，指未来希望；暖灯照耀，意味光明重现，花猫安卧，象征久违和平。丰子恺常以简淡笔墨包裹生活哲思，此画一反往日风格，以背身父亲强化情感张力，让观众代入“举杯邀明月”的狂喜。题字“日本投降后三日”，恰是历史的精准锚点。

《胜利之夜》仅是重庆欢庆的篇章。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广播传来，市民敲打脸盆、摇铃呐喊，将城市变成“声响的海洋”；9月2日，日本在“密苏里”号签署投降书，重庆满街贴上V字红标，鞭炮柏枝售罄；9月3日，解除警报长鸣10分钟，五六万人的游行队伍从较场口出发，人流塞巷，彩灯彻夜不熄——防空照测队的探照灯、商号的霓虹与川剧锣鼓交织，将夜空燃成白昼。

丰子恺的画外，历史细节更显壮阔：中国记者白修德在《中国的惊雷》中描述，农民挑着蔬菜进城，只为“看一眼胜利的模样”；学生撕碎课本折纸飞机，上书“自由”……这些碎片拼出民族的集体疗愈，战争曾让重庆承受200余次轰炸，直

接伤亡3万余人。

《胜利之夜》最珍贵之处，不在于其技法繁复，不渲染悲壮，而正在于它以朴素技法和平凡场景，以日常温情直抵人心，记录了这个光辉的永恒瞬间，浓缩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史诗。建川博物馆专家指出：“‘日本投降’4字，是人间最美妙的词汇。画作是抗战精神的微缩，更是重庆作为英雄之城的铁证。”

八十载时光流转，重庆的狂欢夜随长江东去，但《胜利之夜》的墨色未淡，反因历史沉淀愈显厚重，如琥珀封存时光。当我们驻足《胜利之夜》前，画中明灯仿佛仍在提醒：珍视和平，自强不息。



本版邮箱
ysbj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任姍姍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

陈平原

朋友发来我刊于《光明日报》2015年8月25日的《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》，说那篇文章写得好，问能否再接再厉。5000多字，讲这么个重大话题，只能点到为止。而文章结尾这段话，值得再次引用：“抗战期间，中国大学不仅没有溃败，还发展壮大，此举放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谈论或炫耀，都毫无愧色。此乃中国现代大学史上最艰难但也是最意气风发的时代，其理想与情怀是后来者所望尘莫及的。如何描述此等奇迹？单靠冷冰冰的数字或教科书式的总结，很难体现我的敬畏、缅怀与景仰，于是，不揣冒昧，以文学性的‘风采与气象’为题，希望读者能心领神会。”

那篇文章的思路及材料，基本来自10年前出版的专著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。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，北大出版社问我要不要出增订版，我犹豫了两天，最后谢绝了。但这不等于10年间，我搁置了此话题。相反，每次到各高校演讲，只要对方有意愿，我都会选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，或者在相关讲座中，插入一大段大学西迁的故事。不是因为偷懒，而是认准我有义务为年轻一辈讲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，以及我理解的大学精神。

这样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古代中国从来没有，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——那是因为，美国远在天边，不太受战火影响；英国虽被轰炸，国土未被入侵；法国全境被占领，大学无处

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位于革命老区山西武乡县，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八路军抗战历史的大型革命纪念馆。6554件抗战文物、134件国家一级文物，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八路军强渡黄河，挺进山西，依托太行山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雄故事。

展厅里有一双草鞋，上面的棉线已经断裂，这是叶成焕团长牺牲时穿的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叶成焕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，率部先后参加长生口、神头岭、响堂铺等著名战斗，为129师在全面抗战初期的“三战三捷”作出重大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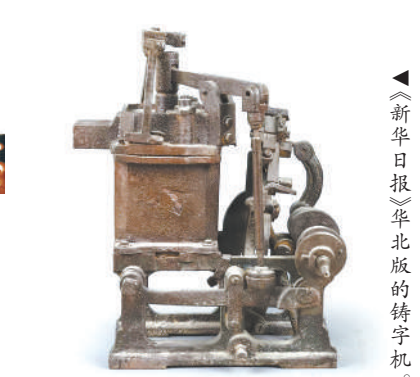
长乐村战斗中，叶成焕在高坡上观察敌军情况时被子弹射中头部。当战士们抬着他后撤时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队伍，队伍呢？”叶成焕牺牲时年仅24岁。长乐村村民董来旺为他整理遗物时，看到叶团长还穿着一双破旧的草鞋，赶忙拿来一双布鞋给他换上，并将这双草鞋保存下来。朱德特地从八路军总部赶来，向叶成焕遗体告别。129师师长刘伯承在追悼会上说，叶团长没有辜负党的教育，终于成为一个很好的布尔什维克。

展柜里有一把残缺的军号，铜管布满弹痕，喇叭口扭曲变形，弯曲的手柄上五道指痕深嵌铜胎。这把军号的主人叫崔振芳，山西洪洞县人，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1年参加黄崖洞保卫战时牺牲，年仅19岁。

1941年11月，日军集结5000精锐部队进犯黄崖洞兵工厂。11日拂晓，崔振芳所在的七连驻守天险“翁圪廊”——通往兵工厂的最后屏障。中午时分，日军在数次进攻失败后，开始释放毒气。崔振芳强忍咳嗽，用尽力气吹出防毒号令。最惨烈的搏杀发生在下午3时左右，日军分三路强攻南口，崔振芳和另一名小战士卫世华利用地形投掷手榴弹，坚守在吊桥边上。战友卫世华牺牲后，崔振芳独自扛起重箱手榴弹，先后投出120余枚手榴弹，炸死日军数十人。突然，一发炮弹在身旁炸响。身材单薄的他，跪着把军号抵在石头上。

经过八昼夜激战，兵工厂保住了。战士们打扫战场时发现，崔振芳的手指仍紧扣着军号，牙齿与号嘴已经熔铸在一起……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1700多名太行号兵把年轻的生命谱成了永恒的号谱。他们平均年龄不足20岁，最小的只有13岁。

抗战岁月里，新闻不仅是信息，更是凝聚人心的旗帜、刺向敌人的利剑。展厅里，国家一级革命文物、华北《新华日报》印刷厂使用过的铸字机，见证了广大新闻战士对敌斗争的峥嵘岁月。



重提抗战中的大学西迁

陈平原

可迁；唯有苏联，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。每回登台演讲，我喜欢引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“绪言”中的一段话：“抗战中，大批中国大学内迁，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——保存学术实力，赓续文化命脉，培养急需人才，开拓内陆空间，更重要的是，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。”

今年也不例外，3月在重庆大学、重庆师范大学、武汉大学，5月在厦门大学，我都曾专门讲述或部分涉及抗战中的大学西迁。

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5集历史文献纪录片《西迁壮歌》，我担任学术顾问和采访嘉宾。为此事，我重新翻阅相关资料，除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刊行的若干浙大西迁图书，我更喜欢读到了《浙江大学在遵义·档案综述》与《浙江大学在遵义·要事记略》。兼及西迁大学与在地学者的眼光和趣味，那样方能更好地呈现这五彩斑斓的“壮歌”。编导到我家沟通，以为我熟悉浙大在遵义，很可能不了解大夏大学在贵阳，看我搬出一大摞图书，包括《大夏大学编年事辑》《大夏文萃》《王伯群与大夏大学》《大夏大学：90年90人》等，还有《抗战贵州文录》《抗战贵州图录》等，一下子愣住了，连称“找对人”了。

《西迁壮歌》的编导，此前邀我参与纪录片《阳明悟道》的制作，这回再续前缘，我马上翻出1940年8月1日竺可桢校长在浙大建校纪念会上的讲话稿：“昔阳明先生甌居龙场，遂成

草鞋、军号、铸字机

鲜血熔铸巍巍太行



▲黄崖洞保卫战崔振芳的军号。

1939年1月1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后沟村创刊，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，也是华北敌后第一份铅印报纸。报社初创，在日寇重重封锁下，物资匮乏。没有纸，报社全员就收集破布、烂鞋，用小毛驴推磨碾纸浆制成麻纸；没有油墨，就从山上砍来松枝，烧出油墨。为保证报纸印刷，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和工作人员越过日军数道封锁线，几经辗转将这台珍贵的铸字机从重庆背到沁县。

百团大战期间，何云带领记者日夜战斗在最前沿，即审即刻，即校即印，以最快速度报道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事迹，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和信心。

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的发展壮大，引起敌人的关注和恐慌。1942年5月，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，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，并把摧毁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列为重要作战目标。为保护这台铸字机，何云等人将其秘密掩埋在武乡县大坪村的一处房屋之下。不幸的是，5月28日清晨，何云在突围中中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37岁。与他一同倒下的，还有黄君珏等40多位新闻战士。

报社先后经历了6次反“扫荡”，7次搬家。尽管转战频繁，炮火连天，却坚持出版，从未中断。1943年9月，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终刊，共出版896期。新闻战士以笔为枪打击敌人，用生命保护党的宣传阵地。

80多年前，无数英雄的中华儿女在太行山上浴血奋战，用血肉之躯筑就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铜墙铁壁，孕育出光耀千秋的太行精神。

（作者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副馆长，本报记者付明丽整理）

以上图片均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提供